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从 书

Academic Library

Wuhan University

杨国安 著

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 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组织与基层社会控制』结项成果
(立项批准号05JC770031, 结项证书号2010JXZ463)

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之『明清以来的国家与基层社会』阶段性成果,
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 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从 书

杨国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杨国安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9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307-10232-3

I. 国… II. 杨… III. ①农村社会学—研究—湖北省—明清时代
②农村社会学—研究—湖南省—明清时代 IV.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743 号

责任编辑:王雅红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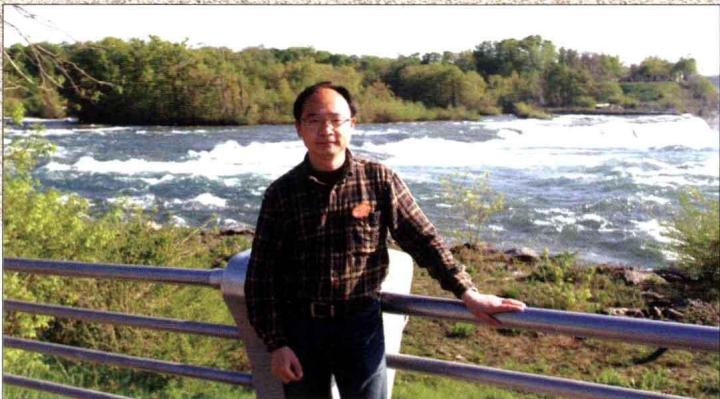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8 字数: 396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232-3/C · 333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杨国安

1971年1月出生，湖北黄陂人。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秘书长。1993年获湖北师范学院历史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理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10—2011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暨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乡村社会史。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组织与基层社会控制”（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间文献与明清两湖乡村赋役征收实态研究”（2011年）等。已出版学术著作《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2004年）。2005年《明清两湖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先后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农史》、《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历史人类学学刊》、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中国台湾《明代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自然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晓红

副主任委员

卓仁禧 周创兵 蒋昌忠 李斐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习山	石 纚	宁津生	刘经南
李文鑫	李晓红	李 斐	李德仁
吴庆鸣	何克清	杨弘远	陈 化
陈庆辉	卓仁禧	易 帆	周云峰
周创兵	庞代文	谈广鸣	蒋昌忠
樊明文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健

副主任委员

冯天瑜 骆郁廷 谢红星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马费成	邓大松	冯天瑜
李 健	汪信砚	沈壮海	陈庆辉
陈传夫	尚永亮	罗以澄	罗国祥
周茂荣	於可训	胡德坤	骆郁廷
郭齐勇	顾海良	黄 进	曾令良
谢红星	谭力文		

秘书长

陈庆辉

内 容 提 要

传统时代“国权不下县”，若要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规律，“从县衙门到家门口”必须得到重视。本书聚焦于当前学术界前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国家与基层社会”，在充分利用传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广泛挖掘、收集民间文献资料，主要从宗族、水利与保甲团练三个方面，展开对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组织与基层社会控制的研究。其创新之处在于，突破原来自上而下强调中央集权的强大，将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视为国家附属物的观点，同时也突破绅权对抗皇权的士绅支配模式，坚持从国家政权建设与民间社会秩序互动的视角，将两湖地方社会看做一个整体，既从国家视野出发，探讨官府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与治理；又从基层社会着眼，揭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与民间秩序的自我构建，由此体现“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之间互动的多元视野与整体史观。其基本内容如下：

(1) 移民、宗族与地域秩序的构建。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中，明清时期的两湖地区构成典型的“移民型”社会。与此前学者关注移民过程及经济开发等不同，本书研究重点在于移民的生计、发展以及如何在定居地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和地方秩序。通过对鄂西北郧西县的田野考察和文献梳理，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种植、经商等多种经营是移民入住本区后的

主导性生计方式，军功、经商、行医与科举则是移民家族晋升的主要途径。土、客矛盾虽然存在，但主要矛盾却发生在移入时间与来源不同的客民群体之间。

在鄂东南地区，其地理地貌呈现丘陵与盆地交错分布的特征，并且由一个个纵横密布的溪流串联起来。此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水稻与旱作等农耕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明清时期，随着江西等宗法文化较盛地区的移民不断迁入、定居并繁衍生息，鄂东南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下，以坟山墓碑的墓祭和族谱的编纂为凝聚族众的手段，通过祠堂的兴建，构建了乡村的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鄂东南祠堂的类别（宗祠—支祠一家祠）与家族结构（宗族—房份—家庭）大体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一个层级较为明晰的家族秩序。

（2）塘堰、堤坝中的水利纠纷与用水秩序。以民间水利文书——崇阳县《华陂堰簿》为基础，本书以微观实证的方法，展现了明清时期的鄂东南丘陵山地，民间水利组织的具体运作实态：对于塘堰等中小型工程而言，由于其涉及的数量多，星罗棋布；所灌溉的区域小，主要是稻田等田畈地亩，民间力量、基层水利组织往往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并利用寺庙等文化资源，以及乡规民约来化解水利纠纷、维护固有的用水秩序。只有当灌区社会不同群体间发生大规模冲突时，他们才会主动寻求国家权力的介入。

而以四邑公堤为代表，在两湖平原的诸多大型堤防水利工程，由于工程浩大且跨越不同行政区，涉及面广，无论是工程兴建，还是组织管理，都需要国家在场。“国家介入”与“跨区域协作”成为两湖平原堤防社会中的地方特色和传统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塘堰主要涉及灌溉区内民众因利用水资源而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属于一种“利益共同体”。而堤防所涉及的人群更多的是基于抵御洪涝灾害而形成的社会关联，属于一种“责任共同体”。

晚清时期的樊口闸坝之争，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提出水资源利用问题最多的水利事件之一，主要凸现了“有形之利”的经济效益与“未然之害”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博弈关系。闸坝修建的纷争就在于各方利益难以平衡和协调：地域之间、行业之间、民众之

间、不同政见官员之间等，而且不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弊得失缺乏客观公正的论证和审视。他们习惯性地动用各种社会资源向官府、朝廷诉求，而真正受益或受损的利益群体之间，恰恰缺乏相互之间的协商对话机制，从而使得地区性水利冲突事件不断扩大化、复杂化和持久化。

(3) 保甲、团练与乡村控制体系的演变。江湖盗是两湖水上社会的边缘群体，以前学界关注甚少。江湖盗滋生的原因虽说与两湖江河湖泊众多相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两湖平原洪水肆掠，民众难有积蓄，生活困窘。而船只的流动性、隐蔽性和分散性使得许多船户不免见财起心，“偶尔”为之。官府则通过编排水保甲，设置巡检司，利用塘汛、水师等，形成多层次、立体的水上控制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盗匪猖獗的局面。但以有限的人力和兵力，面对无穷的江湖盗匪，完全杜绝似无可能，双方始终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状态。

太平天国挺进两湖之际，包括矿工、水手、帮会、佣工、贫民等在内的社会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纷纷加入到太平军队伍中，从而有力地支持和壮大了太平军队伍，但其独尊上帝和反孔政策将广大士子文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而且太平军的进军所带来的杀戮以及匪患猖獗等，使得两湖民众“躲长毛”以避乱成为对那场战争的深刻历史记忆。太平天国运动在冲击两湖地方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激发了传统社会内部的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高擎儒家伦理道德旗号的两湖土人与官府通力合作，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最终帮助清廷渡过了远比明末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危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各地通过创办保甲制度，力图恢复和重建地方社会秩序。随着士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在武昌保甲局中，士绅被委以“总绅”、“里绅”等正式职务，从而开启了乡里役的“士绅化”趋势。

概言之，以上三个专题虽各有侧重，但基本都是围绕乡村社会秩序的自我构建和运行、国家权力的介入以及双方的复杂互动关系展开不同层面的研究。研究初步表明，中央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部分管理和乡村社会的自我运行，共同构成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序　　言

陈　锋

传统时代“国权不下县”，有关县以下的制度与措施、财政与经济、经济与社会等方面记载较少，但若要揭示全景式的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了解基层社会的发展变迁，从中央到地方，从“从县衙门到家门口”，又必须高度重视。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在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范式下，一般认为，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峰，学者大多将重大政治事件、中央官僚制度与政策等作为研究重点，多数成果以结构性描述为主，对明清以来基层社会的研究较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学家吴晗和社会学家费孝通等组织了一个“中国社会结构”的研讨班，并出版论文集《皇权与绅权》，通过士绅阶层透视中国传统的朝廷与地方的关系，体现出将国家与基层社会进行综合考察的学术追求。然而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史学界将研究领域集中于土地制度、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少数问题。尽管也关注到普通群众和下层民众，但学术研究深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某些研究难免有简单化之嫌，或盲目照搬系统理论，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致得骨遗髓、得血失肉，甚或扭曲历史。20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渐次勃兴，基层社会与边缘群体、冷僻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有关基层组织、宗族社会、商会、士绅阶层、会馆、民间信仰等研究成果可观，并以此来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问题。同时，区域社会史也方兴未艾。

从史学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来看，目前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于明清以来国家与基层社会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国内外学术前沿问题，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理路。而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甚至二元对立模式不同，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表现为一种相当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丰富的内涵。而对于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需要我们从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转向财政与经济、社会与文化史等综合的历史考察。将国家史研究与基层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建构更加立体、真实的历史。无论是上个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还是现代西方史学界正在兴起的“社会—文化史”，反映的是一种“总体史”或“综合史”趋势。既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也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小历史”的研究。对于明清以来的国家与基层社会研究而言，在“自上而下”、重视“基层社会史”研究的同时，又“自下而上”，以基层社会为切入点，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微观实证研究，将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有机结合，以全新的视角揭示出明清以来历史演进的内在脉络和原动力。既从经济史、政治史切入，也从社会生活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切入，多一些切入点，多一点思考，形成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格局。而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只有据之以事实，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去探索和描述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逐步形成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学术理路。

杨国安从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对基层社会产生浓厚兴趣，多年来一直执着于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已经出版了《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专著，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好评，并获得武汉大学第十一届（2004—2006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现在又在长期田野考察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政书、方志、文集等传统文献和地方档案，以及族谱、碑刻、民间抄本和田野调查资料，结合作者个人的田野经验，主要围绕宗族、水利与乡村社会控制体系三个大的专题，对明清时期两湖地区乡村社会组织的类型、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乡村社会秩序的实质及其确立，展开了深入仔细的考察，从而深化了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演变及其复杂性与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揭示了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及其演变的区域特征。

在我看来，杨国安的这部著作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首先，作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全书研究的三个部分，分别对应着目前明清社会史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在明清时期，宗族在不同地区的具体表现形态、建构过程及其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以水资源利用及治水为中心而形成的各种社会组织或社会网络，在地域社会所具有的实质及其作用；在传统中国，特别是明清时期，乡村社会的秩序究竟是怎样建立并维系的？这三个问题前此学者关注较少，且至为重要，故得以紧扣学术前沿论题，并通过细密翔实的个案考察，以小见大，得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认识，颇有启迪和见地。

其次，在研究理路上，作者突破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二元对立论，从动态、弹性的多元互动视角探讨了两湖乡村社会中的宗族、水利与乡村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既相互对抗、又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关系。如果说以前对国家政权的分析框架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下移、扩展的问题，是上层权力如何借助乃至利用地方权力的话，那么国家与基层社会互动的研究，呈现的则是国家权力是如何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场景。在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从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分析手法。相对于静态的、结构的分析国家控制或者乡村社会秩序不同，本书尽可能以个案的微观方式，通过历史事件的过程来展现具体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实态，以及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具体体现形式。

最后，在资料的运用和解读方法上，最为突出的特色是努力开展田野考察，将田野考察所得的感性认识与文献研究的初步结论相互印证，并力图将文献置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加以理解、释读，以

期做到“同情之了解”，这种治学精神与方法难能可贵，值得提倡。与作者此前的研究相比，本书研究成果在资料的理解、运用与分析方面，均有较大进步，特别是能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有关资料，而不是不加辨识地予以信从“珍稀资料”。作者尝试着使用一些人类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许还不够纯熟，但这种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本书基本是一个区域性的实证研究，这种细致考察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揭示出地域特点及其内部差异，更将揭示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与规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乡村社会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此项研究对当今的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本专著在立足历史学本位的同时，对同样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相关学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我对乡村社会史和明清基层社会基本没有研究，因为与杨国安有师生之谊，平时有所切磋，略窥一二。此序言作为读后感，仅供读者参考。

2012年8月20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序言	陈 钟	1
第一章 绪 论		1
一、选题的意义与缘起		2
二、学术史的梳理		3
(一) 关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回顾与反思		3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两湖区域史研究述评		16
三、研究的史料、方法与基本思路		21
(一) 基本概念的界定：“权力”、“秩序”及其他		21
(二) 史料与方法：民间文献与田野考察		24
(三) 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多元视野与整体史研究		28
第二章 移民、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的构建		33
一、移民、生计与清代鄂西北山区宗族形态		34
(一) 走进郧西：鄂西北山区的生态环境与移民		34
(二) 移民的生计与发展：种植、经商与多种经营		40

(三) 香口柯家湾：一个山区移民家族构建的个案分析	50
二、村落、祠堂与清代鄂东南家族秩序的构建	64
(一) 聚族而居：地名志、族谱所见鄂东南乡村的聚落形态及其成因	65
(二) 宗祠、支祠与家祠：鄂东南的祠堂类型与家族结构	83
(三) 神圣与世俗之间：鄂东南祠堂的功能及其嬗变	97
(四) 空间与秩序：清代以来鄂东南家族秩序的空间构建	105
三、移植与模仿：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宗族实践	
——以黄陂周氏宗族为个案的考察	108
(一) 黄陂东乡：周氏宗族地理、人口与村落分布	111
(二) 经祖祠自治章程：周氏宗族自治的实施纲领	120
(三) 梅田学校：乡村的新式教育与村落自治	131
第三章 塘堰、堤坝中的水利纠纷与用水秩序	142
一、塘堰与灌溉：鄂东南丘陵山区的水利组织与民间秩序	
——以崇阳县《华陂堰簿》为中心	143
(一) 崇阳县华陂堰及《华陂堰簿》	146
(二) 赋役改革与基层水利制度变迁	152
(三) 塘堰的日常管理与运行	159
(四) 上畈与下畈之间：水利纠纷与灌区社会	165
二、堤防与社会：两湖平原水利中的纷争、协作与官府介入	
——以四邑公堤为例	175
(一) 从一县专任到四邑公修：宋迄清江嘉长堤的兴筑与协济	176
(二) 四邑公修中的利益纠葛与协调机制	189
(三) 堤防水利中的官府介入与区域协作	198
三、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与地方秩序	200
(一) 外江内湖：樊口地区的水系、地貌与洪灾	201
(二) 内乡与外乡：武昌县移民、垦殖与地域社会变迁	212
(三) 屡建屡毁：樊口建闸的曲折历程	218
(四) 彭李之争：樊口闸坝背后的生态、利益与政治纠葛	225

第四章 保甲、团练与两湖乡村控制体系的演变	240
一、江湖盗、水保甲与明清两湖水上社会控制	241
(一) “贼”、“民”之间：江湖盗及其出现背景	242
(二) 月黑风高夜：江湖盗的种种行径及其特点	253
(三) 水保甲及其他：官府的控制手段及其成效	265
二、变乱格局下的地方秩序：太平天国时期的两湖地方社会	280
(一) “奉天诛妖”：太平军挺进两湖与地方秩序之崩溃	281
(二) “躲长毛”：日记所见两湖民众战乱之生活与境遇	292
(三) “从贼”与“反贼”：变乱格局中两湖绅民之反应	303
(四) 保甲与团练：动乱中的官府、士绅及其社会动员机制	328
三、从团练到保甲局：晚清两湖地方秩序的重建与服役的 “士绅化”	352
(一)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团练：地方军事化问题的再探讨	353
(二) 晚清保甲制度与两湖地方秩序的重建	361
(三) 职役的“士绅化”：以光绪武昌保甲局为例	378
第五章 结语	395
一、选择性介入：国家权力的边界	396
二、基层组织的演变与新秩序的构建	398
三、国家与民间互动下的乡村治理	401
参考文献	404
后记	426

图表目录

表 2-1 阳新县白沙镇村庄名称一览表	67
表 2-2 阳新县自然村落平均户口数	68
表 2-3 阳新县梁氏宗族新、老各庄对应简表	74
表 2-4 通山县部分氏族移民、聚居情况一览表	78
表 2-5 黄陂周氏部分参与撰修家谱者名录	125
表 2-6 黄陂周氏各分支暨村落经管人员分配方案	128
表 2-7 黄陂周氏经祖祠经管办事细则一览表	129
表 3-1 崇阳县古代主要陂塘一览表	147
表 3-2 明代大冶县塘堰分布图表	153
表 3-3 清代兴国州塘堰分布表	154
表 3-4 明代武昌县所属主要湖泊	205
表 3-5 明代武昌县河泊所征收鱼课银	213
表 4-1 太平军“兵册”所载湖北民众人营名单	319
表 4-2 太平天国初期士兵供述加入之情形一览表	322
图 2-1 阳新县梁氏宗族聚居分布图	72

图 2-2 通山县方姓聚居分布图	76
图 2-3 阳新县白沙镇梁氏宗祠外貌	91
图 2-4 梁氏宗祠平面布局示意图	92
图 2-5 阳新县三溪镇伍氏宗祠外貌	93
图 2-6 阳新县玉堍村部分公屋与村落关系平面图	94
图 2-7 通山县吴田村大夫第之家祠与住宅平面图	96
图 2-8 通山县宝石村舒氏宗族阴阳两宅图	99
图 2-9 阳新县玉堍村平面图	100
图 2-10 长期充当学校的玉堍村李氏宗祠	104
图 2-11 黄陂县乡会图	112
图 2-12 黄陂东乡周氏村落图	117
图 2-13 黄陂梅田村附近道路图	118
图 3-1 崇阳县华陂堰总圳图	150
图 3-2 清代四邑公堤图	183
图 3-3 四邑公堤历史变迁示意图	184
图 3-4 清代四县公堤图	186
图 3-5 武昌县樊口梁子湖地势情形图	208
图 4-1 光绪年间汉阳府内河外江摆渡船保甲牌式	270
图 4-2 光绪年间汉阳府船户五日水汛报单式	270
图 4-3 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由武昌沿江东进图	285
图 4-4 同治年间湖南李瀚章推行保甲之门牌和十家牌	367
图 4-5 光绪五年（1879 年）湖南安化县保甲门牌	374
图 4-6 光绪十九年（1893 年）湖北汉阳府烟民门牌式	377